

周公百人墓记

文\莫清华

1937年，日寇侵华，在江苏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41年在海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河大屠杀”。

——题记

这里说的周公，不是人物，而是地名。它位于定安县东南部，定城经居丁墟至黄竹墟公路的东侧，距黄竹墟4公里。

周公有个“百人墓”，这个“百人墓”就在周公对面公路边的山坡上，它约2米多高，底部直径有4米多。墓上只有一些青草，没有此地墓茔常见的灌木，可见，每年都有人来扫墓。墓前立着石碑，墓前约五六米远，有落差约1.5米的坡坎，坡坎下便是绕道而过的定黄公路，可见，修路人尊重民意，为保护此墓而绕道修建公路。据说，修建海南东线高速公路时，卫星定位走向，是从这个墓地穿过的，实地测量的技术人员，见到这个墓，看了墓碑上的文字，站立默哀良久，修建高速公路时绕开了此墓，距此墓约2公里。

这座墓，人称“百人墓”，在此长眠的，实际上不止100人，而是109名，他们是惨遭日寇屠杀的抗日村民。

1937年，日寇侵华，在江苏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1941年，在海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河大屠杀”。

大河村，是定安县东南部黄竹墟的一个小村，整座村的多数村民惨遭日寇凶残的大屠杀。这里说“大河大屠杀”，不仅是大河村，还有后田、牛耕坡、周公等3个村的村民。屠杀地点在大河村和后田村，时间为辛巳年（1941年）七月初三。以大河村被害村民最多，因此，统称“大河大屠杀”。

大墓前，立着一座石碑，高约150厘米，宽约40厘米，厚约8厘米。

石碑正面镌刻着：大河 后田 周公 三村抗战同日殉难义士林俊南等一百零九名之墓 石碑背面镌刻着：修墓立碑的缘起，即大河大屠杀的经过，以及遇难者的名字。

严格地说，被害的村子还有牛耕坡村，这个村子才3户，是从大河迁出，因为在这场大屠杀中全被杀害，立碑者因此将之计入大河。

创建墓碑之人为林克琨、林绍荣、符和深、邓天福、黄中文等14名幸存村民，邓天福是被大人用谷缸罩着逃过一劫的小孩。这个碑，立于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岁次乙酉年仲冬，也就是日寇投降那一年。 墓庭平铺着一块约120厘米长，40厘米宽的石匾，上镌刻着时任定安县长钱开新，为纪念林俊南等一百零九名殉难者所拜题“气壮山河”四个楷体字。 这块石匾，缘何放置墓庭？

原来，日寇投降后，在县长钱开新的倡导下，14名幸存者凑钱卜地择日，集中将4个村在日寇大屠杀中遇难的109位同胞的遗骨合葬于此，筑墙围起来。钱开新拜题的“气壮山河”大楷字镌刻的石匾，是挂在百人墓首门上端的。后来，围墙毁废，村民便将这个石匾放置于此。



“大河大屠杀”殉难义士109人之公墓

血红的1941年七月初三

文图 海南日报记者 张婷

定安县黄竹镇周公村委会后田村居丁墟至黄竹墟公路西侧静静的竖立着一块墓碑，碑上刻着：大河、后田、周公三村抗战同日殉难义士一百零九人之公墓。8月16日，74年前1941年的七月初三，日军在海南定安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大河大屠杀”，墓碑的背面刻着这次屠杀惨案中109个村民的名字。

随着时光的迁移，从前的陵园大门如今只剩下四个石墩隐在草丛深处。映着繁茂的荒草，青苔覆盖了墓碑，颜色深浅不一，见证了时光。曾经怀着满腔悲愤刻下的名字，终究抵不住岁月的侵蚀，模糊了印记。只有那阵阵拂过的清风，摩擦着刻痕，一遍遍诉说着许多年前那血洗村庄的悲惨往事。

鲜血浸湿的七月初三

海南省定安县黄竹地区的大河、后田、牛耕坡、周公四个村，位于黄竹墟通往居丁墟公路的东侧。村庄附近的公路上有一座桥，叫做大河桥，抗战时期，它是日寇在定城、居丁、黄竹、加积等墟镇之间互相救援的必经之处，具有一定战略意义。

1941年，定安县委为了扰乱日寇在定城、居丁、黄竹据点之间兵力的部署，多次布置当地党组织领导群众开展破坏公路、桥梁、电话线和散发标语等行动。8月20日（农历闰六月廿八）夜间，大河桥再次被毁。日伪保长吴泽宏向黄竹墟的日寇报告，日寇便疯狂地对大河、后田、牛耕坡、周公四村进行一次大屠杀。

1941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三）早上5时，驻琼东县大路墟（今属琼海市）和定安县黄竹墟据点的日寇出动数十名鬼子兵和黄竹墟据点、排溪岭炮楼的全部伪军近100人，趁着夜黑他们先将大河、后田、牛耕坡和周公这四个

村子包围起来。天刚蒙蒙亮，日寇便以检查“顺民证”为由，挨家逐户搜查，将各村在家的男女老幼共114人分别押到大河村符福茂、符福成、符福祥、符福忠的3间大房子和后田村符清月的1间大房子里关起来。

“日寇派兵架着机枪包围了大河村的3间房屋，所有门窗都被上了锁，只各留出一扇门。他们先是把汽油浇洒在房子上，接着点火，顿时火光冲天。困在房子里的那些无辜村民手无缚鸡之力，只得向着那唯一开着的门冲去，哭声、喊声连成一片。可是，手持刺刀的野蛮鬼子早已守在门口，就等着有人冲出来，而屋子四周上好膛的机枪也迫不及待地对着屋子开始疯狂扫射。”定安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崔开勇多次走访这四个村子，根据幸存者的回忆，记录整理后介绍道。

后田村躲过了大火，却避不开刺刀。日寇将房子里的村民逐一点名押出，赶到附近的一棵大树下，用刺刀刺死或用枪托活活打死。面对惊慌失措的孩子们，日寇也没有一丝怜悯，先是用刀划破孩子们的手背，等孩子们疼得“哇哇”大哭，再将他们反复摔在地上。

就连被母亲紧紧护在怀里的婴儿，日寇也没有放过。他们把母亲刺死后，掰开母亲的双臂，将婴儿抛向空中，挥舞着刺刀比赛看谁刺得准；还有的村民被刺刀剖开肚子，肠子流了一地，日寇却不急着杀，就在一旁嬉笑地观赏着，而那可怜的村民就这么生生挨到第二天才断气。

日寇残忍地杀害了109条生命后，又纵火焚烧所有房屋。熊熊烈火冲天而起，浓烟遮天蔽日，房屋燃烧的爆裂声、坍塌声持续了一天一夜。村民们的尸骸被烧的焦黑，腐臭味混合着焦味，方圆数里都能闻到。

崔开勇告诉记者，大河村118间房子，后田村44间房子、牛耕坡村20间房子，周公村9间房子全部被焚毁，出现了“四村废墟人遗骸”的惨景。这次屠杀后大河村还有8月24日深夜在山上看守庄稼的20多人幸存。而周公、牛耕坡村已变为无人村。

九旬幸存者回忆屠杀现场

“我现在还清晰的记得那些场景，记得那只剩一截的小腿，白骨上缠着几块烂肉，脚腕上却还系着一条长命锁，应该还是个孩子。”今年94岁的符和昌老人是大河村人，也是当年那场屠杀惨案目前唯一活着的幸存者。因为早早上山放牛，符阿公躲过了那场灾难。

1941年8月25日，农历七月初三，早上8点左右，在离村子不远山坡上，19岁的符和昌一如往常去山上放牛。突然间几声枪响震彻山谷，符和昌放眼望去，只看见村子方向浓烟滚滚，仿佛还听到了那些熟悉的街坊四邻的哭喊声。符和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

去亲戚家躲了三个多月，再次回到家乡的符和昌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泥土仿佛都被鲜血浸成了猩红色，尸体腐烂后留下的根根白骨衬着红土越发刺眼，乌泱泱的苍蝇好似黑云萦绕，腐肉的恶臭味蛮横地直冲肺部。

“我看到一个50多岁的妇女半挂着吊在围墙上，应该是想要逃跑，准备翻墙，被日军给打死了。”直到现在，符和昌还可以回想起当时看见的每一个细节。他的爸爸和弟弟都被烧死了，只剩下一早出去干农活的母亲和他相依为命。

四村114人仅5人幸存

四个村此次共被日寇杀害109人，其中大河村79人，后田村23人，牛耕坡村3人，周公村4人。而在村中幸存的5人分别是牛耕坡村的符福堂、还未成年的符和茂和邓天福、后田村的林绍茂和符清月的妻子。

牛耕坡村的符福堂是武术师傅，自幼习武所以练得一身好功夫。他在被押回大河村途中，看准时机徒手袭击鬼子兵。打斗中，他腰部被鬼子刺中7处，强忍剧痛逃到大河溪边，纵身跃下潜水逃脱。

符和茂当年仅八九岁，邓天福也不过十二三岁，身材都较瘦小，事发时他们被关在大河村的3间大房子中。日军点燃房子后，一同被关的大人们决意联手保护这两个孩子，便将屋内的两个大龙缸倒扣过来盖住他们，再用棉被包裹住，以防木料烧断后砸坏龙缸。两个男孩因躲在缸中而幸存。

后田村的林绍茂和同村的其他25人被集中关在符清月的1间大房子里，两个鬼子兵将他从房内押到大树底下时，林绍茂灵机一动，将身上的几块光洋掏出扔到几米外的地上，两个鬼子兵见钱眼开，猛扑到地上争抢，林绍茂趁他们不注意纵身逃脱。

屋主符清月的妻子则躲在屋中一张简易床底下。日军将24人拉出去以后，有一个鬼子兵走到床旁，简单检查床下未发现有人，便以为屋里人已被害光，走了出去。符清月的妻子因此幸存。

日寇投降后，时任定安县长钱开新倡议村民将殉难村民尸骨集中择地，择日安葬。钱开新还拜题“气壮山河”的牌匾。此墓俗称“百人墓”，就在定城至黄竹公路的周公地段路边。自1946年至今，村民无论男女，每逢七月初三，都来此祭奠英灵。



屠杀惨案的幸存者符和昌老人。